

# 拾碎集

刘学洙

贵州人民出版社

# 拾碎集



贵州人民出版社

责任编辑 龙光沛  
技术设计 荀新馨  
封面设计 石俊生

拾 碎 集

刘学洙

---

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贵阳市延安中路 9号)

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贵州省新华书店经销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5印张 100千字

1987年9月第1版 1987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2,000

---

书号：10115·712 定价：0.80元

## 序

《拾碎集》是刘学洙同志的杂文集。这本集子收集了他写的文章四十五篇，其中多数是杂文，仅少数几篇是散文和游记。刘学洙同志长期从事党的新闻工作，六十年代初期，我们在报社工作一起，一同下乡调查、采访，那时大家除完成新闻工作方面的任务外，常将所见所感写成杂文和散文，他是我们当中写作勤奋的一位同志。多年来，他对杂文的写作少有间断，到现在可以说是“积稿盈帙”了，这几十篇杂文，只不过是他的部分代表作。

学洙同志现在是报社主笔，写作勤奋，嘱我为序，心中非常惭愧，只好勉力以从。

杂文是政论文和文艺结合的产物。他的杂文具有这两方面的特点。在杂文的写作上，他与其他杂文作者还有一点不同之处，他写的杂文多数是为了报纸工作的需要而写的。写前经过调查研究，或根据党的精神，因而能够紧密结合当时的思想倾向和实际产生的问题，针对性强，思想犀利，显现

出他的杂文谨严、鲜明的风格。精微的言辞，独特的见解，常闪现在字里行间，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。

出于自谦，他将他的杂文集名为“拾碎”。这不禁使我想起清代文学家张潮《幽梦影》中的话：“一言一句，非名言即韵语，皆从肠次体验而出，故能发人警省，片言碎语俱可宝贵……”我认为杂文的写作也应是这样。正因刘学洙同志对问题刻苦的琢磨，揭示的尖锐，虽说是“拾碎”，但“片言碎语”在激励人心、针砭时弊上却起到警省的作用，发挥了杂文应有的功能，名与实是一致的。

当此书出版之际，谨写数言于卷首，作一简识。

唐莫尧

1985年12月25日

读一则火灾消息	( 61 )
共产党人不需要恭维	( 64 )
爱民篇	( 67 )
记住先驱者的血	( 70 )
披荆斩棘示新人	( 73 )
希望之火在燃烧	( 76 )
不准想·梦想·理想	( 82 )
谈勇敢	( 86 )
目标始终如一	( 91 )
从学习历史经验中打开眼界	( 95 )
青年命运之所系	( 102 )
做一个有道德的人	( 106 )
用历史的眼光看问题	( 111 )
喜看农村气象新	( 118 )
从实际出发是一门大学问	( 123 )
求富必求才	( 127 )
农民的新追求	( 130 )
两眼盯着山	( 133 )
赶鸭客	( 135 )
泛舟渭南河	( 141 )
典雅的水灯节	( 144 )
博物馆遍国中	( 147 )
“非洲大森林”	( 150 )
两位新闻界朋友	( 152 )

## 小草的风格

《小草》这首抒情歌曲，我不知听过多少回。可是，从来没有象前天听滚雷英雄安忠文歌唱时感受那样深。

“没有花香，没有树高，我是一棵无人知道的小草。从不寂寞，从不烦恼，你看我的朋友遍及天涯海角……”

安忠文稳稳地站立在主席台上，用平静而深沉的声调，赞美着默默无闻的“小草”。这是英雄的自述，是人生真谛的颂曲。听了他的歌声，我抑制不住淌下了热泪。

安忠文，一个不惜以血肉之躯滚雷的英雄，他为祖国献出了双目，献出了右腿。促使他做出震撼人心的伟业的，却是他那朴实无华的芳草寸心。他不羡慕做那百蝶追逐的名贵香花，也不希冀成为傲视四方的参天大树，只安心做一棵无人知道的小草。他懂得，没有小草，祖国母亲就将无蔽无盖，狂风暴雨就会无情地冲刷她的肤体。人间就不会有鲜花似锦，大地就不会有绿荫遮蔽。

小草是伟大的，又是平凡的。我想起；当我们漫步在街头，

也曾见过许多荣军老战士，他们走在人群中，人们依然会对他们流露敬意。我又想起，当我们驱车在山区公路上，从路边铺石子修路的道班工人身旁缓行而过时，也曾向他们投以感激的目光。……我们伟大祖国的一切轰轰烈烈的成就，难道不都是从这无数无人知道的“小草”默默的奉献而积成的吗？！

小草最知足，最知恩，最知爱。他“从不寂寞，从不烦恼”。因为，他只知奉献，不知索取。听吧：

“春风呀春风你把我吹绿，阳光呀阳光你把我照耀，河流呀山川你哺育了我，大地呀母亲把我紧紧拥抱。”

小草爱春风、爱阳光、爱山川、爱母亲。对人世间的一切美好事物，它都充满感激之情，而对自己所作的一切，总感到不足，不足。

小草是平凡的，它淹没在绿茵之中无人知道，然而它也是不朽的。它植根大地，又哺育着大地。亿万棵普普通通而又顽强奋斗着的小草，为我们的祖国带来了活力，带来了春天！

(1985年)

## 好 学 多 思

人们常说，八十年代的青年是思考的一代。这话不错。

青年人爱思考，是好事，决不是坏事。只有林彪、“四人帮”和一切没落阶级，才需要青年愚昧、迷信和狂热的崇拜，而手握真理、坚信未来的先进阶级，总是希望青年打开眼界，独立思考。这几年，我们党中央领导全党拨乱反正，首先就是从思想上展开的。我们要坚决冲破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严重束缚，恢复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，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。今天青年思想活跃，不轻信，不盲从，这正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正确路线在青年思想上产生的积极成果，是历史性的伟大转变的一个生动表现。

但是，思与学，不可分离。“学而不思则罔，思而不学则殆”。不掌握科学的思想武器，真正的独立思考是不可能的。

我们每个人的思考能力从哪里来呢？是从实践中积累和提高的。这里包括直接实践和间接实践。社会现象、历史现

象纷繁复杂。光凭个人有限的经验进行思考，是远远不够的。人们总得汲取前人和今人丰富的认识成果，借以扩大眼界，提高认识能力。这就是学习。拒绝这个学习，是愚蠢的，幼稚的。

远的不说，就以十年内乱这个复杂现象而言，十亿人民思考它，全党思考它。这个思考的结论是什么呢？我认为那就在于《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》里边。靠个人思考，靠我们青年思考，能达到这样高的认识水平吗？

再如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，一切关心祖国命运的人都在思考，全党都在思考。这个思考的答案是什么呢？我认为那就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二大的重要文件。它是现阶段我们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集中体现，是全党全国人民智慧和正反两方面经验的结晶。靠个人思考，能全及其万一吗？

因此，我们千万不可以把独立思考片面地推崇到绝对的地步，把学习社会科学理论与教条主义、说空话混为一谈。这里，有一个小例，一天，电台广播“知识与生活”节目。几个青年听到内容是十二大文件介绍，就说：这算什么知识？我告诉他们，这怎么不算知识，全世界不知有多少中国问题专家在研究它哩！从这件事我想到，许多青年喜欢思考社会现象，可是，对于我们党总结了如此丰富的实践经验写成的许多重要文献，往往不注意学习。他们以为西方启蒙思想家的大部头著作才是知识，这些政治文件不算知识，这是很大的片面性。百年来中国先进的人们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

真理，经历了痛苦的思考和学习的过程，终于找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，作为观察和解决中国问题的锐利武器。伟大如鲁迅，他也承认自从学习了马克思主义，才明白了许多“纠缠不清的疑问”，才纠正了他“只信进化论的偏颇”。我们有志于振兴中华的青年，难道不应当从这里得到启示和教益吗？

五四运动刚爆发不久，胡适曾经写过一篇文章，叫做《多研究些问题，少谈些主义》，欺骗青年要自己一点一滴地去研究问题，不要信马列主义。李大钊当时立即著文加以批驳。这件事距今已经六十三年了。今天，我们仍应记住，那种标榜一切都靠青年自己去思考，而无须认真学习革命理论的主张，同样是对青年的欺骗。八十年代的青年，既要勇于思考，又要善于学习。我们应当是好学多思的一代。

（1982年）

## 人言可畏与不可畏

韩愈在《原毁》里，对那种出自嫉妒心而贬低别人、打击别人的小人心理和手法，剖析得鞭辟入里。他在文章的末尾，慨叹“事修而谤兴，德高而毁来”，用现在的话说，便是谁工作干得多，谁遭非议；谁正派，谁遭骂。这样不公正的待遇，在封建社会自然是常见的。

不过，《原毁》的精义似乎不在此。依我看，要緊的还在最后一句：“将有作于上者，将吾说而存之，其国家可几而理欤”。原来，韩文公著书立说，是为了给当权者进言。希望当权者从中悟出一点用人之道，不受流言所左右，把国家治理得好些。这是韩愈的苦心所在。

对于种种流言，领导者清醒确实很重要。文人相轻，自古亦然。这个“相轻”，曹丕的本意是指文坛上比试高下和衡量文章的是非得失。正如鲁迅指出的，并不包括“一切别的攻击形体，籍贯，诬赖，造谣”等等。可是，后来由“相轻”而至“相毀”，你抓我的辫子，我查你的三代，攻其一

点，不及其余，这就一点文人的味道也没有了，有的只是政客和奸商之风。“文革”时期，此风达到登峰造极，这是人们记忆犹新的。这种遗风现在的市场是越来越少了。不过，也并未绝迹。平时倒也相安无事。一碰到提干、入党等关键时刻，有些人便“相轻”、“相毁”得相当激烈。所谓“花八分钱邮票”投书诬陷，让你内查外调忙半年的手法，不就是一些人惯于采用的吗？人们据此引出“人言可畏”的结论，甚而皱眉蹙额，一筹莫展。

人言固然可畏，但还是韩愈说得对，关键在于“将有作于上者”的态度和明断。相轻也罢，相毁也罢，只要主事者头脑清醒，明辨是非，力排众议，唯才是举，“人言”又何足畏哉！

近读《人民日报》，安徽涂县县委和县政府敢于起用能人。在他们那里，并不是没有可畏的“人言”。县委要起用一个很有本事的人，马上“流言四起，把他说得一无是处”。看来，比起韩愈所说的“举其一，不计其十，究其旧，不图其新。恐恐然惟惧其人之有闻也”那样的症候，有过而无不及。可是，县领导偏不买这些账，看准了就任命这个人当摩托车配件厂厂长。“人言”，在涂县就不那么可畏了。

当然，这样做也不容易。用人，有识还得有胆。当领导的最忌讳是“用人不当”，“重用坏人”，怕落个“根子没扎正”之类的罪名。为了保险起见，为了保乌纱帽，宁用无所作为的庸人，也不敢起用有争议的能人。经不起一点“人言”的包围，不敢出以公心，这往往是一些地方和单位人才被压抑

的一条重要原因。

这里，我当然丝毫没有鼓吹用人不看品德之意，更不是主张群众意见可以不听。“人言”也有种种。在一般情况下，多数的“人言”，应当说是公正的，只要当事者兼听善辨，少数心术不正的人嘁嘁喳喳、诽谤之声，就不足以干扰自己举贤选能的决心。这一点，涂县的经验即是明证。

(1985年)

## 驯良未必良

在电影《红衣少女》里，十六岁的中学生安然，对她妈妈的为人不大佩服，居然说：“妈妈，我看不起你”。这种直率和不敬，颇招来一些非议。

我因而想起了鲁迅。鲁迅晚年得子，爱是当然的。可是，有一回，孩子因为什么事不高兴，竟然批评起鲁迅来：“我做起爸爸来，还要好……”“这种爸爸，什么爸爸”！鲁迅听了，不认为有损为父的尊严，相反，觉得这证明自己不算是怎么坏的爸爸。假若，把孩子压得头昏脑胀，孩子还敢当面发表“什么爸爸”之类近乎“反动”的宣言么？！

要是鲁迅还健在，想必他是会赞扬安然的。这决不是鼓励孩子无法无天，随便反对父母。因为，只有孩子没有奴性，才能勇于思考，勇于创造。而我们传统的教育思想恰恰与此背道而驰。

记得，小时我常听长辈夸奖孩子驯良。驯良是什么意思，当时不懂，因为它带有一点古雅。不过，总觉驯良反正是好话。后来，从进学校到进入革命队伍，更多听到的是夸某人听话，嫌某人不听话。这意思就明白易懂了：听话就是乖孩子、好学生，就是好干部。最近，党中央讨论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时指出，我国这种教育思想是陈腐的，从家庭到学校以至整个社会，至今影响很深。这的确是击中积弊。

用是否驯良和听话，作为判断人们贤不肖的标准，渊源久远。孔夫子就喜欢驯良听话。孔夫子和颜回谈话终日，颜回一直是“不违如愚”，一味点头称是，像个憨包。事后孔子发现颜回的言行是照他指示去说去做的，便高兴得不得了，赞曰：“回也不愚”。

以驯良和听话律己诲人，实在不那么高明。《淮南子·说林训》说：“马先驯而后求良”。驯良，就是温顺善良。不驯呢？就是桀骜不羁，就是不良。大凡骑术不精者，驾驭不了烈马，总是喜欢驯马。推而及人，也喜欢低眉顺眼、唯唯诺诺的驯人。然而，这样的驯人一多，这个民族，这个国家的生机也就完结了。

倡扬“听话”、“驯良”这个传统，至今还使我们承受着很重的历史惰力，应该改革。鲁迅说得好：“对一切事无不驯良，却决不是美德，也许简直倒是没出息。”“爸爸”和前辈的话，固然也要听的，但也须说得有道理。”倘若，人人都只会两眼望着爸爸，望着老师，望着上级领导，终日“不违如愚”，甚至“理解的执行，不理解的也执行”，其结果将如何

呢？“殷鉴不远”，焉可忘怀！

(1985年)